

《文史哲》编辑队伍风采



孙微: 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讲授“杜甫研究”“杜诗学研究”“诗词格律与写作”等课程, 著有《清代杜诗学史》, 参与编撰《杜甫全集校注》《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等。

近距离感受《文史哲》的古典学术立场

2021年底, 我进入《文史哲》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 主要负责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稿件, 目前还在熟悉和适应工作阶段。

《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 也是国内创刊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 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 是对《文史哲》创刊70年来成绩的肯定, 也是对山东大学文科的肯定。作为编辑部的一分子, 我也备受鼓舞, 与有荣焉。

加入编辑部以后, 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史哲》“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的办刊理念。编辑部全体同仁团结奋进, 严谨高效, 密切关注学术论争的焦点, 注重刊物对学术潮流的引领作用; 同时又能坚守古典学术立场, 具有独立不迁的学术品格。这一切令我感触颇深, 很受教益。今后我会继续向编辑部各位同事好好学习,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认真做好编辑工作, 为《文史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叶杨曦: 南京大学文学院学士、硕士,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2021年12月调入《文史哲》编辑部, 从事文学板块相关工作。2015年10月入职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主要研究领域为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已完成与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7项。已出版专著1部, 古籍整理1部, 在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译文多篇。



从仰慕到加入

2021年之前, 我对《文史哲》杂志的主要印象大致可概括为: 专业、包容、开放、争鸣。我一直在南方读书, 参加工作才第一次来济南, 可以说对整个北方了解不多, 但我很早就听说过《文史哲》的大名。我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读本科和硕士期间, 常听叶杨曦先生等师辈谈及应养成通过阅读专业期刊学习论文写法、了解发展趋势、把握最新动态的习惯, 《文史哲》即在老师们推荐的名单之列。2012年我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跟随陈平原先生攻读博士, 先生指导我在古代和近代、文学和历史、中国和域外的交叉领域探索研究选题, 我因而更关注那些包容性强的学术期刊, 并发表征稿启事。当时大陆期刊设置其他语种版面的做法都不太多见, 更遑论直接开辟一个像 JOCH 这样的新期刊。我很佩服《文史哲》的开放性和国际视野, 还修改了讨论法语学界《文子》研究成果的博士课程作业给 JOCH 投稿。2015年在山大文学院参加工作后, 多次听博士后合作导师曾繁仁先生提及保持学术敏感性的重要性, 这加深了我对《文史哲》“争鸣”性质的认识。《文史哲》每期刊发的都是论辩色彩浓厚、问题意识突

出的“大手笔”, 商榷、辨析、讨论性质的争鸣文章亦不乏力能扛鼎之作。

2021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肯定了杂志创刊7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贡献, 也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我也去旁听了《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 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 并十分羡慕在学刊工作的同仁。2021年底, 我调入《文史哲》编辑部, 参加文学方向的编辑工作。在久负盛名的《文史哲》工作, 从一开始心里很忐忑, 主编王学典先生和同事们热情无私的指导和帮助, 则让我如沐春风。我还了解到, 曾任《文史哲》主编的陆侃如先生是江苏海门人, 这无疑增加了我的亲切感, 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海门山上。

来编辑部工作后我进一步认识到: 《文史哲》稿件的编辑工作很规范, 有严格的三审三校流程; 她的学术生命力十分旺盛, 一方面力求站在学术前沿, 通过前瞻性选题引领学术风气, 践行著名史家陈寅恪所提倡的“预流”的学术, 另一方面又奖掖后进, 注意发现、提携年轻学者。《文史哲》无远弗届的学术影响力, 盖缘于此。我希望自己尽快掌握编辑流程, 站好编辑岗位, 以工匠精神 and 使命意识精益求精地做好《文史哲》的工作。



察应坤: 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 《文史哲》编辑部史学编辑。负责自明清到近现代史学研究的约稿以及编辑工作。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美国中国学等, 发表《基层权力组织再造——民国乡村建设实验的“菏泽模式”》《东亚崛起的文化资本——狄百端新儒家思想史“内在研究进路”辨析》等学术论文数篇。

肩负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使命

大约2000年, 在本科学习阶段读书时, 我在图书阅览室第一次翻阅《文史哲》杂志, 当时即感到这是一份非常庄重、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这种印象一直维持到现在。

《文史哲》自创刊以来, 一直是发表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更可贵的是, 读者还能从这些论文中感受到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中一脉相承的文化特性。《文史哲》的办刊宗旨是“昌明传统学术, 锻炼人文新知, 植根汉语世界, 融入全球文明”, 以文化自觉的精神自觉肩负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乃至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这份沉甸甸的使命, 既是国家、人民、时代赋予《文史哲》的, 也是《文史哲》自创刊之际建立起的辉煌传统的内在要求。

2021年, 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文史哲》的办刊传统与总书记这一指示高度契合, 全体同仁将为此投入更大的工作热情, 包括更大力度地继承“延揽大学者, 扶持小人物”这一办刊传统, 既延揽成名成家的大学者的高屋建瓴之作, 也为有潜力、有思想的年轻学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



陈嘉礼: 1988年生于中国香港, 先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兴趣包括中国上古史、甲骨文、民族记忆、中国史学史。2020年开始担任《文史哲》国际版的编辑。

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我从研究生时代开始, 就一直关注《文史哲》, 虽然不是每一期都看, 但闲时总会在期刊网阅读《文史哲》的文章。《文史哲》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期刊, 刊登的文章论点新颖, 值得深思; 《文史哲》的文章是我进入中国人文学科殿堂的最好桥梁。在过去的治学岁月中, 我总是向《文史哲》文章学习如何撰写一流水平的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要“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 《文史哲》国际版就是把中国人文学术介绍给国际学界, 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沟通的重要平台。作为国际版编辑, 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文史哲》的内涵和底蕴之丰富, 《文史哲》悠久的历史、继往开来的承担得到了国家的肯定, 这都让我很受鼓舞。

我过去单纯是《文史哲》的读者, 2020年亲身参与到《文史哲》国际版的编辑工作, 和同事们一道致力于将中国文史哲文化和厚重的中华文明介绍到国际学术的舞台。《文史哲》国际版是“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新兴平台。我们会承先启后, 发挥所长, 刊发高品质论文, 助推中国学问走出去, 争取将《文史哲》国际版办成世界人文学术的顶尖期刊。

我作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的教师, 以编外身份参与《文史哲》国际版的工作, 主要负责书评栏目。这出于以下几个特殊的缘分。

2017年夏, 我曾在《文史哲》发表过一篇有关蔣介石研究的论文; 原稿长达两万多字, 几乎一字未删, 这次顺利的刊印, 既出于王学典老师对题目与素材的嘉扬, 也代表着编辑部同仁对我的文字能力的肯定。我在美求学、工作多年, 硕士与博士皆在亚利桑那大学, 导师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陶晋生院士、鲍家麟教授夫妇。陶晋生为“吃货”学派创始人、民国学者陶希圣第四子, 故此, 我的师门传统极为重视社会经济史, 更确切地说, 是重视探讨文学和史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成因和规律。我的英文博论即探讨明代文学中的明代经济生活, 题目颇为小众。其后我将英文稿加以扩充、转译为中文, 名之为《衣食行: 醒世姻缘缘》中的明代物质生活, 王老师读过, 颇为欣赏。作为专治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方家, 王老师于吃货学派的渊源、特色, 本自雅有精研; 拙稿惠得推荐, 收入山大“文史哲”丛书, 201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 王老师对我的肯定与谬知, 更多的是针对我所承担的学术脉络, 而非我

编外人说名编

个人能力云然。我所游颇杂, 专业和语言训练几经易径, 王老师何尝会看不到我的“阿基里斯之踵”? 他一直认为我应钉住近代史或近代学术史的站位, 曾对我提出过不失温厚的警示。对于这一点, 我是感念兼之的。

我本出身中文, 出于对文学的眷爱, 最终还是又漂回了中文, 放弃了多年的史学训练, 如今的所务, 几乎完全囿限于旧体诗词和英译了。“中岁功名无一艺, 览书半豹欲惶惶。”——《衣食行》成稿后, 我曾读了四首七律, 内中有一联作是般愧语, 正是因为念及长者的温责。王老师以国际版的工作属累, 我唯“敬告不敏, 摄官承乏”, 做点相关的工作, 主要为同类稿件的择取、书评的约稿、往复、修订等务。《文史哲》的中文稿件, 我也偶有参与校审之幸。顾思念, 总是觉得做得很不足, 幸得同事们谅解我在外编, 凡不能竭走输力处, 总为优容。专业编辑们对《文史哲》的奉献精神, 是最应让我学习的。



刘晓艺: 山东大学中文硕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史哲》国际版书评编辑。发表C刊/英文论文17篇, 出版中文专著5部、英文专著1部、英文译著1部。

“出玄入道熏沐往哲一代高文多灼见, 编辑荐才奖掖后进千秋儒林传嘉风。”这是广璞兄为《文史哲》编辑部前任主编丁冠之先生追悼会拟就的一副挽联。挽联精确地概括凝练了丁主编一生的为人、为学与为师。值《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 我作为一名有幸与丁老师共事多年, 并深受其教诲的后学, 谨就丁老师的为编之道略记一二, 以资纪念。

“可要好好干呀!”

我1985年大学毕业后, 即被分配至《文史哲》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在学期间, 《文史哲》的声誉于我已是如雷贯耳, 没想到自己竟有如此际遇, 与这份在学界享有崇高地位的人文学术名刊结下不解之缘。

最初, 编辑行当于我甚是神秘。还记得报到前的几天, 心中不免常常想象和“型塑”名刊主编的形象: 一定会是一个满脸严肃、不露声色的长者。想到这些, 心中不免有些惴惴。及至去编辑部办公室报到时, 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报到地点在数学楼二楼, 一个像办公室又像会议室, 同时又似资料室的大房间, 约有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离门口不远的地方, 摆着一张深绿色的乒乓球台, 球台的东、北两侧, 是挤满书刊的书架。在球台与书架之间的一把陈旧的椅子上, 端坐着一位面色红润的长者, 一手握着一个白瓷茶杯, 一手捏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在办公室刘主任的介绍下, 始知这就是《文史哲》的时任主编丁冠之先生。与自己的想象恰恰相反, 面前的长者和善而慈祥, 没有一丝严肃而令人畏畏的影子, 自己原本有些紧张的情绪也就慢慢地放松下来。

丁老师先是了解了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然后就编辑部的基本状况和工作流程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 并就我的工作做了初步的安排, 嘱我在工作过程中多向有经验的老编辑请教。这些我都一一记下。

初次见面, 丁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至今不敢忘记的, 是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小刘, 我们只是给系里要了一个名额, 也没有去调研和考察, 你的情况我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既然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可要好好干呀!” 这句话饱含着期望和责任的话, 时常萦绕耳际, 至今难以忘怀。

丁冠之先生教我做编辑

刘京希

“丢了命, 也不能丢了稿子!”

初入编辑行当, 大都是从编务做起。刚进《文史哲》编辑部的时候, 我在责任编辑工作之外, 还兼做稿件登记、联系兼职编辑、跑印刷厂等杂务。其中, 最喜欢的活儿就是跑印刷厂送稿子、取(送)清样。因为跑印刷厂能意外“享受”到校领导一般的“待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文史哲》杂志一直是由省新华印刷厂负责印刷。选择省新华, 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 历史的原因。那时在杂志的版权页上, “出版者”标注为山东人民出版社, 这可能是杂志在省新华印刷厂印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 省新华印刷厂的印刷质量高, 且“重合同守信誉”, 每期都能按时交付, 从不拖期。第三, 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 是省新华的校对水平高。省新华的校对车间, 集中了省内印刷行业最为整齐和庞大的校对队伍, 好像有四五十人的样子。而《文史哲》的刊文, 以古典人文居多, 常常有信屈聱牙的生僻字出现, 有时甚至需要临时造字, 这正好为省新华的排版和校对师傅们提供了用武之地。甚而至于是, 作者和责任编辑没有发现的疏误, 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 《文史哲》交给省新华, 放心! 但是, 由于省新华地处济南市西南方向, 距地处东部偏北的山东大学, 约有二十余华里的距离, 在交通还很落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往来十分不便; 尤其是在那个有些“原始”的、稿件要靠手工誊写的纸媒时代, 送取的稿件在编辑人员的心中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所以, 每次送取稿件或清样, 都是编辑部以单位的名义向学校车队要小车, 专车接送。现在看来, 这实在不算什么, 但在那个时候, 享受到“坐小车”的校级待遇, 还是很有满足感的。我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 没少享受这等待遇!

每次去省新华, 丁老师都不忘再三叮嘱: “可要好好稿

子。丢了命, 也不能丢了稿子!” 是的, 不只在丁老师眼中, 即使在我们普通编辑眼中, 也把稿子看得比命都重要。原因很简单, 那时候的稿件, 大多都是手写“孤本”, 编辑部没有底稿, 没有复本, 一旦丢失, 就无法弥补, 更难以向作者交代。所以, 时任办公室主任耿老师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每次去省新华送稿件, 即使是坐在“专车”上, 也不忘习惯性地把那包视如生命的“宝贝疙瘩”紧紧地抱在胸前。

一词之师

于光远先生谈到治学时曾经说过: “学者之为学者, 就是善于咬文嚼字。”无独有偶, 丁老师也一贯认为, 当一名合格的编辑, 尤其是学术期刊的编辑, 面对的都是善于咬文嚼字的学者, 自己更要学会咬文嚼字。

记得我初为责任编辑时, 收到一篇法学稿件。经过初审、复审程序后, 呈交丁老师终审。过了一段时间, 稿子终审。丁老师在与我交流审稿意见的时候, 除了正常的对终审意见的说明, 还特意就稿件中的一个表意词汇使用的“小问题”, 和我交换看法, 这实则是我做编辑的修行。文章在表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 采用了“目迷五色”这一鲜为人们使用的成语。我觉得这样表述不仅鲜活贴切、形象生动, 而且令人耳目一新。但丁老师不很赞同作者的这一用词, 认为换作“眼花缭乱”更为合适。我不解, 觉得“眼花缭乱”太寻常普通了, 不如“目迷五色”来得新鲜。丁老师随之这样耐心解释道: “写学术文章, 不是写文学作品, 一味追求鲜活、新奇。学术文章贵在朴实扎实, 靠说理取胜, 而不是靠文采取胜。”这件小事虽然已经过去三十余年, 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事情虽小, 于我却不失深深的教益。

“眼高, 手也要高”

作为主编的丁老师, 时常教导大建、平生、全成和我等几个刚刚从事编辑工作的小字辈, 如何提高自己的编辑技

能和水平。

丁老师常对我们说起的一句话就是: “人常说‘眼高手低’。初为编辑, ‘手低’不要紧, 但眼一定要高。眼高才能选出好文章。”当然了, 这只是他对我们几个初为编辑者提出的基本要求。随着我们几个人的编辑工作渐入佳境, 他也循循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你们也要写文章, 要经常练手。不仅眼高, 手也要高。”正是得益于丁老师的循循善诱, 我们几个小字辈在编辑工作之余, 都结合专业所学, 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不时有文章见诸报章杂志。这些, 丁老师都看在眼里, 打心眼里为我们几个后生高兴。他还时常在业务会议之余, 专门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一些鼓励和鞭策的话, 以培养我们做研究的兴趣。在丁老师的严格要求下, 几个小字辈经过这样不停地“练手”, 不只是审读来稿的眼光高了, “手”也由低而“高”了起来。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我们几个小字辈对学界的研究动向也更加了解, 组织起稿件来也就更加得心应手。

“做一名学者型编辑”

“做学者型编辑”, 是丁老师极力倡导和反复强调的学术期刊编辑的努力方向与目标。

“学术期刊的编辑, 不同于通俗性期刊的编辑, 我们所面对的投稿人, 往往都是本学科的专家, 甚至不乏大家。所以只有努力提高自己, 掌握各自所责编学科的编辑动向, 才能更好地与专家沟通, 找准并抓住选题。”在编辑部的业务会上, 在省高校学报研究会青年编辑培训会上, 丁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灌输他的这一编辑理念。他不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就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魏晋南北朝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专家。1980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嵇康哲学思想研究》和收入《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的《嵇康评传》, 揭开了嵇康哲学研究的新篇章, 奠定了他在玄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在丁老师的言传身教下, 在编辑之余, 大家尽可能地挤出时间从事专业研究工作, 参加相关专业的学术研讨会, 编研结合, 编研相长, 互为助益。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编辑理念, 《文史哲》厚重、扎实的古典人文风格才得以不断地发扬光大和代代赓续。而今, 争做“学者型编辑”, 已然成为《文史哲》编辑部的光荣“传统”和“学统”。